

Mc  
Graw  
Hi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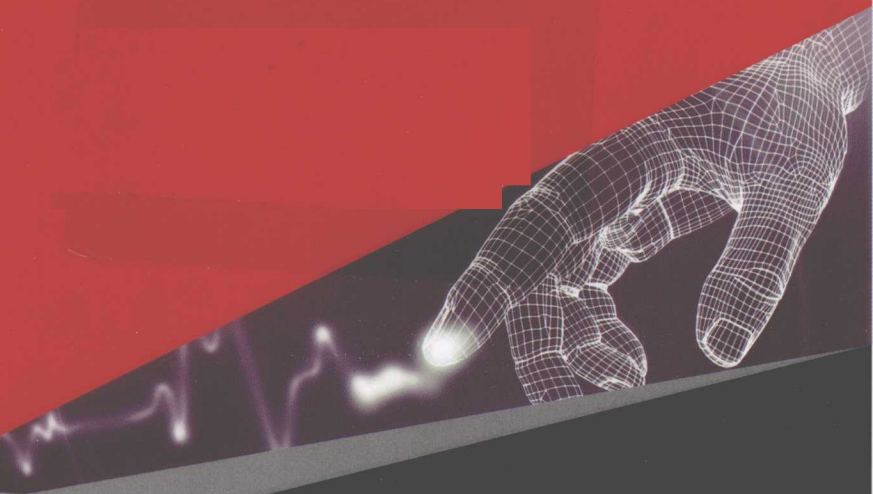
Education

Rethinking  
Cultural Policy

• 文化创意产业译丛

# 重新思考文化政策

[英]吉姆·麦圭根(Jim McGuigan) 著  
何道宽 译



Rethinking Cultural Policy

• 文化创意产业译丛

# 重新思考文化政策

[英]吉姆·麦圭根(Jim McGuigan) 著  
何道宽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新思考文化政策 / (英) 吉姆·麦圭根著; 何道宽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文化创意产业译丛)  
ISBN 978-7-300-11761-4

- I. ①重…  
II. ①吉… ②何…  
III. ①文化事业-方针政策-研究-世界  
IV. ①G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2541 号

文化创意产业译丛

**重新思考文化政策**

[英] 吉姆·麦圭根 著

何道宽 译

Chongxin Sikao Wenhua Zhengce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15.25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94 000	定 价	3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文化创意产业译丛》总序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相互交融，文化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文化已经形成为一个产业，而且正在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群。文化产业逐步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从而也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包括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艺术欣赏、广告、动漫、娱乐等等在内的文化产业，在为国民获取信息、学习知识，享受审美、娱乐的同时，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把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到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高度来认识，我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创造更多更好适应人民群众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举措。

与传统的一般物质产品的生产方式相比，文化产品作为精神产品，它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和运行规律。近年来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获得了快速健康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刚刚起步，无论是对文化产业运行规律的认识还是对文化产品经营所积累的经验都还远远不够。而西方国家在文化产业理念、经营管理以及实际运作等方面都进行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探讨，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把这些成果介绍到国内，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必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也可使我们知己知彼，提高我国文化产业运作的管理水平和整体竞争力。为

此，我们邀请一些专家对国外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和实际运作的著作进行了认真的筛选，组织翻译这套“文化产业译丛”，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套“译丛”中既有在西方和整个世界影响巨大的名著（如马克卢普的《美国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等），也有近年来在西方刚刚出版就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如《文化产业》、《文化与艺术经济学》等）。这套“文化产业译丛”是个开放的系列，我们将不断把国外文化产业研究的优秀作品纳入其中，也期待着各界向我们推荐相关的优秀作品。

当前，文化产业的国际化趋势正在加强，这种国际化趋势使我国的文化产业融入国际文化产业的竞争大舞台之中，我国的文化产业公司与一些大的国际文化公司一起同台竞技，共处一个竞争平台，这无论是对我们的文化产业研究者还是文化企业的经营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相信，这套“文化产业丛书”所引介的“他山之石”，一定会为建设我国的文化产业大厦添砖加瓦，从而对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研究、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在编选、翻译这套“文化产业译丛”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国内文化产业研究界很多专家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等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很多同志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文化创意产业译丛》编委会

# 译者前言

## 一、文化产业考

“文化产业”一语诞生于1944年，见于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与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所著的《启蒙辩证法》（*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他们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这个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

彼时，“文化产业”是他们大众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泛指商品生产，用单数的概念，且特指资本主义组织大规模生产的方式，所以他们的“文化产业”实际上是“那种文化产业”（the culture industry）。他们对文化产业持批判的态度，认为“文化产业”标志着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文化的堕落。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和美国人大异其趣。同一时期的美国人比如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就讴歌大众文化，推行文化与传播研究的经验学派，并将其命名为行政研究；拉扎斯菲尔德那篇被人广泛征引的《论行政和批判传播研究》的文章就是这个经验学派的宣言书。

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流派。其堡垒是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领

军人物有斯图尔特·霍尔 (Stuart Hall)、雷蒙德·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理查德·霍加特 (Richard Hoggart) 和爱德华·汤普森 (Edward K. Thompson)。

伯明翰学派的思想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其领军人物多半出身寒微，深刻理解工人阶级，主张阶级分析，试图用自己特有的文化研究方法和人类学方法打破英国的“贵族”精英传统。他们对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抱肯定的态度，这是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歧之一。伯明翰学派的矛头直接指向美国传播界的“行政学派”，它高扬意识形态的旗帜，揭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化产业”在欧洲、美洲和澳洲蓬勃发展，亚洲各国也奋起直追。“文化产业”的概念从单数的 culture industry 走向复数和多元的 culture industries。文化产业的研究也随之蓬勃发展。

## 二、创意产业考

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率先提出“创意产业”的理念。1998年，以布莱尔为首的新工党政府组建了一个特别工作组，由政府官员和文化企业家组成；1998年和2001年，这个工作组两次发布研究报告，分析英国创意产业的现状并提出发展战略，1998年的报告题名《创意产业规划图》(Creative Industries—Mapping Document)。布莱尔政府重视文化产业，这是其显著特征之一。自此，“创意产业”一语逐渐走红，大有取代“文化产业”之势。不过，“文化创意产业”的混合用法也很流行。1994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提出了“创新国家”的议程。自此，“文化产业”的概念就拓宽到“创意产业”的概念了。

几乎与此同步，我国的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也得到蓬勃发展。



各省市都创建了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基地，文化产品和创意产品的研发、制作、交易、消费、展览都一日千里地发展起来了。冠名“中国”、落户深圳的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已经举办了五届，类似的博览交易会也在全国各地兴起。

麦圭根对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的概念做了这样的梳理：“复数的‘文化产业’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其生产和流通的产品首先是有意义的商品；如今，在官方的话语中，‘文化产业’这一术语已经被‘创意产业’取代，包括广告和信息技术。”

### 三、威廉斯的文化政策研究

雷蒙德·威廉斯曾经将文化政策分为政策“本身”和政策“展示”两部分，他确认了五种国家与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五种文化政策，其中的三种关系与文化政策“本身”（cultural policy ‘proper’）相关，两种关系与作为文化“展示”的政策相关。作为展示的文化政策是：国家形象放大（national aggrandizement）的政策和经济还原主义（economic reductionism）的政策。有关文化政策“本身”的政策是：公共经费资助艺术的政策；媒介调控政策；文化身份的协商构建政策。

文化政策“本身”是有关艺术、媒介调控和文化身份的外显的政策。文化展示政策多半是潜隐的，偶尔才会一目了然。国家在文化展示里的角色应该是对艺术、文化和媒介的发展起辅助作用。

麦圭根对这五种文化政策逐一进行了介绍。

文化政策“本身”的研究一般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进行的，但一个日益彰显的趋势是：一国之内的不同地方亦有文化政策差异，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文化政策在欧盟的文化政策中最为明显。

放大国家形象的文化政策以彰显国家/民族特色为目标，大大小



小的各种展览会、博览会尤其国际博览会都是为了展示地方和国家的形象，反映了与会地区和国家的激烈竞争。

经济还原主义的文化政策将一切文化活动还原为经济活动。经济还原主义就是“经济原教旨主义”，亦称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它崇尚市场力量，将市场力量当作一种教条和普世价值。麦圭根把巴黎迪士尼乐园作为经济还原主义文化政策的突出例子。

麦圭根列举并剖析了许多展览会、博览会、标志性建筑，借以说明国家形象放大政策。

展览会的例子有：1797年卢浮宫广场上的展览会、1851年伦敦的万国博览会、继后的历届世界博览会比如1893年的芝加哥博览会，以及其他各种大型的展览会；标志性建筑的例子有：1889年修建的埃菲尔铁塔，20世纪后半叶法国兴建的卢浮宫金字塔、巴士底歌剧院，新国家图书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奥赛博物馆。我们还可以补充悉尼歌剧院，北京的世纪坛、水立方、鸟巢、奥运场馆，上海的博览会场馆以及中国各地的文化、体育、建筑地标。

《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专辟一章研究文化政策。逐一研究上述五种文化政策，且专辟一节分析英国的新千年庆典、“千禧穹顶”的展览会，分析透彻，论说精细，且富有戏剧性。

#### 四、麦圭根的重新思考与贡献

麦圭根不囿于威廉斯的文化政策研究，《重新思考文化政策》名副其实，有所发明，有所创新。

本书开宗明义，给文化政策下了一个最简明的定义：“文化政策是关于文化和权力的研究。”

同时，作者区分了狭义的文化政策和广义的文化政策，他说：“文化政策既可以狭义地观照，又可以广义地审视。广义地说，我们



可以审视管理者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狭义地说，我们可以研究围绕文化问题的争论。本书从广义的观点看文化政策，同时又近距离审视文化领域的公共范畴和私人范畴的具体运行。”

麦圭根将文化政策话语分为三种：国家话语、市场话语和市民/交流话语。他论述了三种话语的关系：从国家话语向市场话语的变迁的趋势非常明显；在国家话语里，国家被视为文化政策里的关键动因，政府对文化事业进行补贴；市场话语的政策放手让市场发挥作用，市场力量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市民/交流话语源于市民社会，它关注交流和文化的民主化，并构成上述两种话语的对立面。

应该承认，这是非常简单的概括，每一种话语均有特定的目的，但这些话语绝不仅限于“文化”和文化政策的范围。

麦圭根及其《重新思考文化政策》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可以在“文化与媒介研究丛书”主编斯图尔特·艾伦的高度评价中窥见一斑：“……对政策取向的文化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它成功地指明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阐明了当前论战核心里几个激动人心的课题。在阐述批判的反身性的研究路径时，麦圭根挑战在当前的文化决策中走红的工具主义命题……此外他认为，文化政策日益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促使我们再透彻地思考一些紧迫的问题……超越狭隘的工具主义和还原主义的文化研究路径……研究一套批判性问题，包括品牌经营与全球剥削、放大国家利益和大公司利益的文化政策以及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旅游业的冲击。在研究这些课题的过程中，麦圭根考问正在露头的文化资本主义，他强调有必要为公共利益而研究，强调民主论辩。”

略加梳理，麦圭根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他提出“新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概念并予以批判。“还有一个表述是本书提出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他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当前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话语，“我所指的这

种意识形态就是那种无所不包的、全球规模的、与技术决定论结盟的市场理性话语。”他给新自由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新自由主义是“19世纪自由放任（自由贸易）经济学在20世纪末的复活，其关注点是将国家控制的市场力量解放出来，世界范围内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力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

他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发展中国家根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原理重建，这一政策必然有利于富国和强国，显然最有利于美国。”

其二，他考问正在露头的文化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是杰勒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提出的概念，意思是，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里，符号和象征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和流通成了当今资本主义的核心，文化已经融入资本主义，文化公用领地已经被资本圈占了。麦圭根主张约束文化资本主义，他敦促政府进行调控，支持市民话语里反制文化资本主义的干扰运动和文化环境运动。

其三，他深刻揭示品牌经营对全球剥削体系的依赖，揭露跨国公司通过品牌经营榨取“血汗工厂”劳工剩余价值的血淋淋的事实。以耐克为例，他说：“一双‘空中飞人乔丹’的耐克牌运动鞋在美国的零售价是150美元，比其欧洲售价略低，它在世界各地的血汗工厂的成本价是5美元。大多数血汗工人是妇女和儿童，他们在‘第三世界’的所谓‘出口加工区’或‘保税区’工作，每天挣一两个美元。”

他引用一首打油诗讥讽美国的品牌消费：“美国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亿万美金的品牌/美国文化不再由人民创造/在今天的美国，自由、真诚的生活不再可能存在/我们的大众媒介散布赫胥黎似的‘细胞’/美国的‘酷’成了全球流行病/但地球资源再也不足以承载追求玩‘酷’的美国式消费。”



其四，麦圭根考问“自由”的假象，揭示“自由”的代价。在本书结尾，他用一大段话做出令人震惊、发人深省的结论：“有必要强调指出文化与权力之间隐蔽的关系，有必要提醒读者不要受表面现象的蒙蔽……冷战高潮时，美国政府投入大量的资源，在西欧搞秘密的文化宣传……由此可见，即使自由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许多有批判锋芒的知识分子加入形式微妙的宣传阵线，不知不觉间受了蒙蔽，以为自由是真的自由……自“9·11”事件以来，这个自由的国土居然要用《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来保护；实际上，这一法案被用来窒息异见、封闭话语世界。”

## 五、各章提要

第一章“文化分析、技术与权力”对文化观念本身进行考问，对文化政策研究做了界定；探讨文化和权力的关系，评论“技术决定论”，揭示品牌经营对全球剥削体系的依靠，介绍了政策导向的多维分析。

第二章“三种文化政策话语”研究国家话语、市场话语和市民/交流话语及其相互关系。

第三章“文化政策‘本身’（proper）与文化政策展示（display）”阐述并发展雷蒙德·威廉斯对政策“本身”与政策展示所做的区分，介绍官方政策的运作，探讨文化如何被用来放大国家利益，如何为经济目的服务，考察了大型博览会的传统，以法国 20 世纪后半叶的文化政策为例做了生动的说明。又详细叙述并分析了英国的新千年庆典及“千禧穹顶”展览会，雄辩地证明了国家形象放大政策和经济还原主义政策的博弈关系。

第四章“发展修辞、多样性修辞和旅游业的修辞”考问文化发展与多样性的范式，考问其修辞特征和实际效果。这一范式既可能

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适应，也可能是对其抵制的手段。作者对旅游业进行解剖，借以对文化发展与多样性的范式进行批判，指出发展旅游业方面穷国和富国的不平等。

第五章“文化、资本主义及批判”研究文化价值和文化重要性上升的问题，研究文化资本主义的兴起，探讨诸如文化“衰微”和私有化等问题，并对贯穿全书的文化政策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做了小结。

## 六、说长论短

吉姆·麦圭根是英国文化学派第二代的著名学者，20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他勤于笔耕，已出版十来部专著。他正值盛年，研究成果呈爆炸性增长态势，仅2009年就有两部著作问世。他继承了雷蒙德·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理查德·霍加特、斯图尔特·霍尔等人的英国文化批评传统，并有所发扬。《重新思考文化政策》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优点已如上述，但其不足也显而易见，比如，该书对美国这样一个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大国几乎没有提及；又比如，它过分偏重左派批判，对中翼、右翼和比较温和的批评着墨不多。

从同情的立场出发，这种不足或许有以下诸多原因吧。（1）囿于丛书范式的规定，不能任意发挥；（2）作为英国开放大学的教材，它必须要体谅读者的接受水平；（3）不到20万字的篇幅不可能包罗万象，挂一漏万在所难免；（4）《重新思考文化政策》成书于2004年，此后的产业发展和政策思考尚待续写。或许，他今年（2009）问世的《“酷”资本主义》和《文化分析》就是这样的续篇吧，可惜，我们暂时还看不到这两本书。

和一切左翼批判学派一样，和一切“脱离市场”、市场价值不高



的学术研究一样，英国文化学派曾遭受挫折。2002年6月，英国伯明翰大学决定关闭名震全球40余年的“当代文化研究所”，原因并不是它不能给学校带来声誉，也不是它学术产出不多，而是因为在校内的教学评估体系中它只评上了3.5星级，说明其经济效益不好。

这使我想起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研究所的命运。1979年9月他第二次中风后，多伦多大学为他量身定做的“文化与技术研究所”再也不能在他的领导下呼风唤雨了。1980年6月，校方决定关闭该研究所，这是对他的沉重打击，或许还加速了他的死亡。须知，17年苦心经营的研究所成了他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几个月之后，在1980年最后一天的深夜里，他在睡眠中安静地去世了。尽管几年以后多伦多大学恢复了“麦克卢汉研究计划”，尽管多伦多学派第二代的精英包括麦克卢汉的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苦心经营着这个调整后的研究计划，但昔日研究所的辉煌似乎是难以恢复了。

衷心祝愿英国文化学派的第二代精英们走得更好！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09年5月15日

谨以此书献给莱斯莉

## 致 谢

本书部分章节的早期版本分别见于《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的《批判方法论》（*Critical Methodologies*）、《国际文化政策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以及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编辑的《文化与公民身份》（*Culture and Citizenship*）。第三章有关“千禧穹顶”的个案研究是我为艺术与人文学科研究会所做的项目《新千年体验的意义》（*The Meanings of the New Millennium Experience*）。

会议、讲演和研讨课使我有机会试验我的文化政策思想。最重要的会议有：1996年3月在萨塞克斯大学教学会议上的“文化教学”讲演；1996年7月在巴黎科学博览会期间举行的“集体身份与符号表征”研讨会上就“流行文化”所做的讲演；1997年11月在悉尼的“文化研究十字路口”国际研讨会上的讲演；1997年11月在设菲尔德“媒介传播与文化研究之关系”研讨会上的讲演；1999年4月在哥本哈根大学“文化政策北欧论坛”上的讲演；2000年6月在伯明翰大学第三届“文化研究十字路口”国际研讨会上的讲演；2000年8月在于维斯屈莱（Jyvaskyla）大学“文化政策暑期学校”的讲演；2002年1月在惠灵顿举行的“第三届文化政策国际研讨会”上的讲演；2002年7月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会在巴塞罗纳举行的“跨文化传播研讨会”上的讲演；2003年3月在斯德哥尔摩由瑞典教育与研究学院承办的“知识社会研讨会”上的讲演。

在此期间，我有幸在以下几所大学就文化政策发表讲演，它们



是：伦敦大学的戈尔德史密斯学院、利兹的都会大学、设菲尔德大学、韦克舍（Vaxjo）大学、沃里克大学；在回程的路上，我又访问了挪威的卑尔根大学和于维斯屈莱大学。在这些学术访问中，我和许多同人及学生的谈话使我获益良多，这推动了我关于文化政策的思考。我想特别感谢的人有：埃里森·毕尔（Alison Beale）、埃利昂诺拉·贝尔菲奥（Eleonora Belfiore）、奥利弗·本尼特（Oliver Bennett）、彼得·杜兰德（Peter Dueland）、特里·弗卢（Terry Flew）、丽萨妮·吉布森（Lisanne Gibson）、若斯坦·格里斯普鲁德（Jostein Gripsrud）、戴夫·黑斯蒙德夫（Dave Hesmondhalgh）、阿尼塔·康加斯（Anita Kangas）、川岛（Nabuko Kawashima）、戴维·卢斯利（David Looseley）、佩尔·芒塞特（Per Mangset）、阿尔伯特·莫兰（Albert Moran）、凯文·穆尔卡西（Kevin Mulcahy）、默里赫·洛克（Mauriche Roche）、马克·舒斯特（Mark Schuster）、艾伦·斯坦布里奇（Alan Stanbridge）、马茨·特隆德曼（Matts Trondmann）、盖尔·韦斯特汉姆（Geir Vesthem）、迈克尔·沃克林（Michael Volkerling）和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

近年来，我有幸在拉夫堡大学出色的社会科学系工作，特别感谢在研究和写作本书过程中从诸位亲密同事那里得到的惠助，他们是：米克·毕利格（Mick Billig）、艾伦·布莱曼（Aln Bryman）、戴夫·迪肯（Dave Deacon）、约翰·唐尼（John Downey）、麦克·盖因（Mike Gane）、阿比盖尔·吉尔默（Abigail Gilmore）、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麦克·皮克林（Mike Pickering）、丹尼斯·史密斯（Denis Smith）和多米尼克·林（Dominic Wring）。我还要感谢斯图尔特·艾伦（Stuart Allen）的耐心且极其到位的编辑工作。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项是感谢我的家人——莱斯莉（Lesley）、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和詹妮（Jenny），再次感谢他们的宽容。

于利明顿

2003年7月